

徐桐. 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景观人类学 [J]. 风景园林, 2021, 28 (3) : 10-15.

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景观人类学

Cultural Turn in Landscape Studies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徐桐
XU Tong



中图分类号: P901;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21)03-0010-06
DOI: 10.14085/j.fjyl.2021.03.0010.06
收稿日期: 2020-10-31
修回日期: 2020-12-21

徐桐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城市保护与城市设计、文化景观与遗产保护
XU Tong, Ph.D., is a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conservation and urban desig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摘要: “景观”起源于地表形态研究, 并作为地理学基本研究视野, 经历了“区域特性”“人地关系”“文化史”等研究主旨的转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文化转向”。存在主义视角下的景观的文化认知, 需要以理解性方法解析其地方情感和意义维度, 以获取“知觉知识”作为新的研究范式。而几乎同时, 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呼应了景观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论需求。由此,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基于地理学景观研究主旨历史脉络梳理, 进一步厘清现象学视角下“景观”的文化现象本质; 并由景观“知觉认知”的研究主旨、范式需要, 阐释“景观人类学”作为交叉研究领域的研究范畴, 以及未来其应用于景观研究实践的潜力。

关键词: 景观; 地理学; 人类学; 景观人类学; 文化转向; 知觉认知; 解释性方法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 (编号 17SRC018); 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 (编号 17YJCZH19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51708028);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编号 BJFU2019JYZD002)

Abstract: “Landscape” originat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s the basic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geography, it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themes such 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cultural history”. Since the 1970s, there has emerged a “cultural turn”. The cultural cognition of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needs to analyze its local emotions and meaning dimensions with the Verstehen Method, and obtain “perceptual knowledge” from the “other’s perspective” a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the “spatial turn”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echoed the new vision and new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landscape research, thus giving birth 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in the 1990s. Based on the above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text, this research further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From the research purport and paradigm needs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cognition”, it explains the research category of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the landscape research practice in the fu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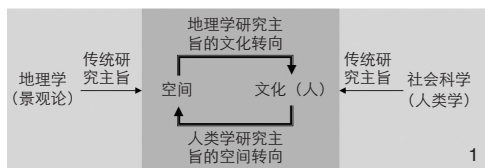
Keywords: landscape; geography;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cultural turn; perceptual cognition;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Fund Item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No. 17SRC018); Social Science Fu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7YJCZH193); Young Scientists Fund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o. 51708028);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oject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o. BJFU2019JYZD002)

1 研究背景

1992 年, 第 16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 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 作为特定类别列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

这是国际遗产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着重探讨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最终成果, 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的特定类别也标志着遗产保护从历史性、建筑性视野转向文化性视野, 特别是在



1 地理学（景观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人类学研究的
空间转向意图
The cultural turn in geography (landscape theory) studies
and the spatial turn intention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地理学中作为研究范式的“空间意义的文化性解析”进入遗产保护领域之中。

上述在遗产领域中的转变并非孤立事件，代表“空间文化意义”研究的文化景观作为学科研究范畴，已经在地理学中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并多次出现研究主旨的转向。20世纪90年代进入文化遗产领域中的景观概念，既包含地理学中对“人地关系”研究的景观论传统，也是地理学研究主旨从“空间特征”向“文化现象”转换的最新成果，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对于景观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130]。与之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空间转向”（图1），通常作为社会文化研究“客体”存在的景观要素成为研究的“主体”，通过解析景观的文化意义塑造过程，开辟研究人类群体文化结构的新的认知视野。以此为背景，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英国人类学领域的景观人类学具备了交叉学科特征，成为地理学、人类学交叉研究的最新领域。

由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作为地理学基本研究领域的“景观”及其研究主旨的发展过程，并审视景观研究“文化转向”对“空间文化意义解析”提出的新的学术范式研究要求。

2 景观研究主旨的转换与发展

笔者讨论的对象“景观”，其本身在中文属于外来语，对应英文“landscape”的翻译。作为外来语的“景观”主要有“生态学、地理学以及艺术学的韵味”^[2]。其源于“日本植物学者三好学博士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前后对德语‘landschaft’的译语”，最初用于“植物景”学术研究中，后日本地理学与都市

社会学领域也使用“景观”这一日文汉字译法，并在20世纪30年代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成为中文语汇之一^[3]。

再次考校“landscape”的原始内涵，其古英文并不具有美学或情感（文化）意义，而是指地表空间要素组合，特别是乡村聚落土地^[4]。17世纪早期，荷兰的风景绘画中使用了“landschap”一词，用以描绘风景绘画空间景深的特殊构图方式^[5]。在风景绘画者的影响下，landscape逐渐指一个地区的外貌，尤其是表示风景^[6]。此外，在古荷兰语中的另一词汇landskab和德语landschaft都包含了社区、地区和管辖权的法律和行政理念：将景观（landscape）作为传统行政单元（customary administrative unit）^[7]。上述双重含义，共同支撑空间审美意象（scenery）与空间地学（geography）。特别是后者，符合地理学对空间单元划分、区域特性认知的需求，并以此被引入地理学研究范畴^[8]。

进入地理学视野中的“景观”，其研究主旨经历了如下主要转向：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景观的研究主旨为区域划分和特性的认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文地理学建立自然景观、文化景观二元论后，景观的研究主旨为解析其蕴含的人地关系；20世纪20—70年代，景观学派建立后，景观的研究主旨为其见证的文化史解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景观研究出现文化与情感转向后，景观的研究主旨为解析其蕴含的地方文化与情感价值。这些研究主旨的转换，推动了对“景观”本质的认知及其研究范式的转变（图2）。

2.1 作为区域特性描述的“景观”概念

基于德国地理学关注于地貌形态研究的传统，首先发展出对地理单元特性的景观研究。德国科学考察旅行家、植物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其晚年著作《宇宙》（Kosmos, 1845—1862年）中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引入地理学中，并将其解释为“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9]。洪堡的开创性研究促使德国景域学派（Landschaft School）的形成，使景域学派在19世纪末成为区域地理学概念的核心^[10]。

景观一词被引入地学研究后，已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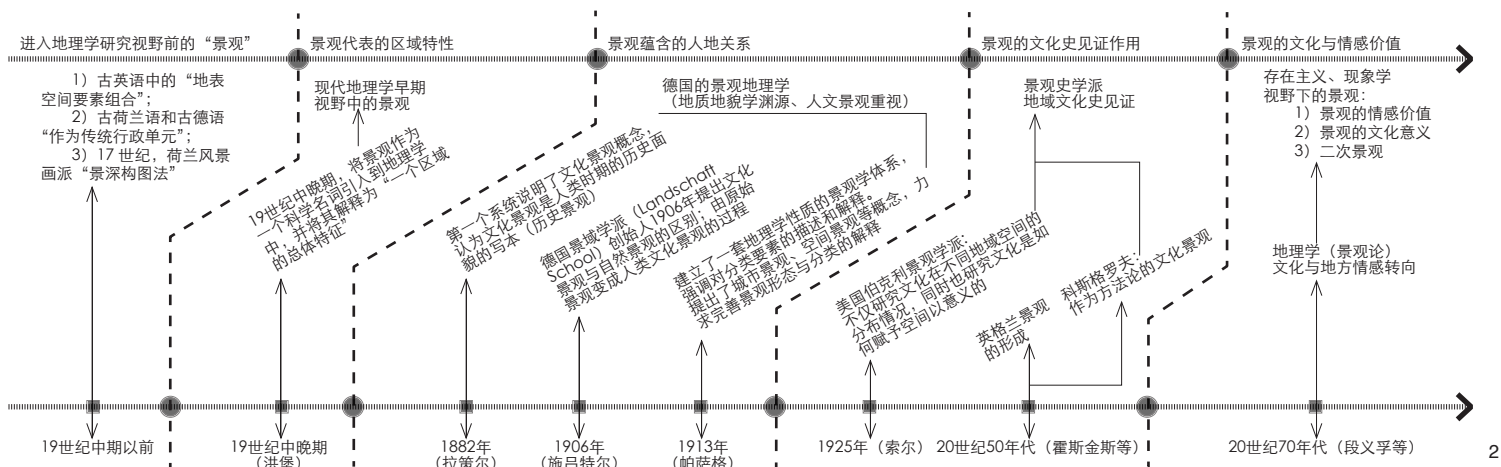
只具有视觉美学方面的含义，而是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特征）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10]。德国景观地理学创始人帕萨格（Siegfried Passarge）在其著作《景观地理》（Landschafts Geographic）中，将景观定义为“由气候、植物、地形、水系、地质及土壤等要素所反映的，带有明显单元特性的地域”^[13-4]，显然，这里的景观更接近于作为地志学（regional geography）研究的自然景观的概念。

2.2 作为“人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景观”概念

以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作为分界，揭示环境与物种分布的演化论（Evolutionism）对历时性、动态性视野，以及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人与环境关系”研究主旨的新开端，在人类学、地理学中出现了“环境决定论”主题。

在此之前，德国另一位地理学家李特（Carl Ritter）在其著作《地理学及其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之关系；或比较地理学》（Die Erdkunde/The Science of the Earth in Relation to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Mankind; or, General Comparative Geography as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Study of, and Instruction in, the Physical and Historical Sciences）中，坚持“寻找影响人类群体命运的环境因素”。李特认为地理学是解释人类命运的重要学科，强调地理学对解释历史的重要性^[11]。

德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受演化论的影响，致力于研究人类迁移、文化借鉴和人地关系的“人类演化论”。在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中将“人与环境关系”作为研究中心主旨，取代区域特性描述。值得注意的是，拉策尔也是人类学家，其在出版上述地理著作的同时，也出版了《民族学》（Völkerkunde, 3卷, 1885、1886、1888年）。这样的双重身份使拉策尔很早就建立起了人类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视野，其在《人类地理学》第一卷中“追溯不同自然特征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在第二卷中，“虽然也将人类



2 地理学“景观”研究的主要进程示意图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in process of the study of geography "landscape"

社会与自然特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但是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群体的文化上”^{[11]215}。

1906年，德国景域学派的创始人施吕特 (Otto Ludwig Karl Schlüter) 提出，“地理学家首先看到的是地表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的事物，而这种感受的总合就是地理景观”。施吕特将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大规模改变之前的地理景观定义为“原始景观”，而“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所建立的地理景观”，他认为追寻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的一系列过程就是地理学的主要任务^{[11]221}。

2.3 作为“文化史”解析工具的文化景观

承袭施吕特，20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和美国的景观学派^④将研究视野从人地关系中的环境决定论，转换到对驱动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化的具体社会集团的属性、机能和变化的研究^{[12]34}，从而形成了新的景观学派，将文化景观视作文化史研究的工具。

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德裔美国学者卡尔·索尔 (Carl Ortwin Sauer)。他吸收并发展了德国地理学者帕萨格和施吕特的景观的概念，于1925年发表了《景观形态学》一文，“景观”这一术语被引入到美国地理学中^[13]。由索尔及其在伯克利的同事，历史学者博尔顿、人类学者克罗伯^{[12]31}^⑤，以及索尔的学生们共同建立了景观研究的伯克利学派。索尔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

文化是驱动力，自然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9]133}。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霍斯金斯采用了类似观点，在他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Landscape, 1955年)中提出“对于知道怎样阅读的人来说，英国景观本身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丰富的历史记录”，“景观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或者景观中的历史跟我们原本意义上所学的英国的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变迁的历史、城镇化的历史都是息息相关的”^[14]。

作为文化史解析的景观研究延续至20世纪80—90年代，研究学者“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分析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英裔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 (Denis Cosgrove) 把景观重新定义为“观察的方式”，而不是影像或物体。他解释：“(景观是) 通向观察之路，某些欧洲人用以向自己和其他人再现其世界，以及再现他们与这个世界之关系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它 (景观) 说明了社会关系。”^[15]

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学派建构起了从景观形态解析“文化史”的充分视角。作为承袭“人地关系”的文化史景观学派，其前提仍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人为行为具有“理性”的假设，即相信“人类的重要决策都出于理性选择”，由此景观的“研究焦点集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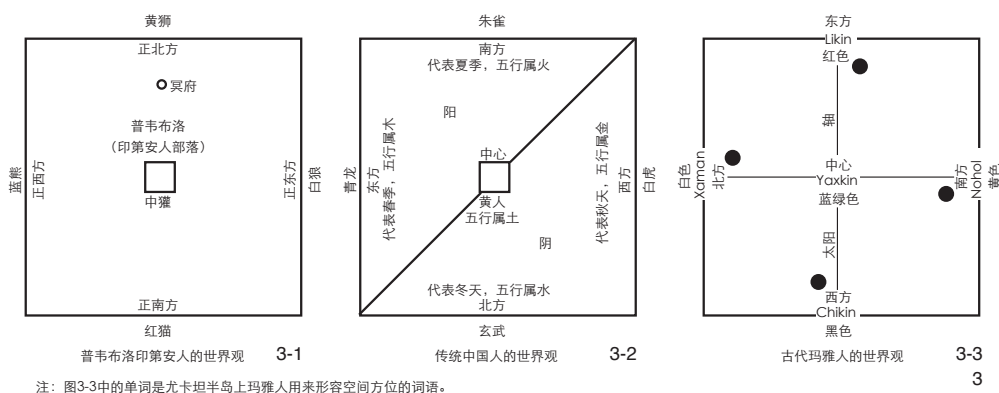
表现社会功能的土地利用形态，以及作物的轮作和区域的组织”。其基本假设是，人类的理性选择行为将通过上述群体组织行为而“呈现在景观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结构特性之上”^{[13]38}。

3 “文化转向”的景观研究及其主旨

3.1 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

上述“人类理性”的前提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地理学中发展至顶峰，伴随而至的是对绝对理性带来的机械性、忽略人文价值的质疑。甚至，景观学派对形态学分析的传统也被质疑，“通过景域的研究途径，将区域地理的研究范畴集中于特定类型的空间分区，寻找可见的特征……至于不可见的特征：譬如活动流量，居民的态度、想法和主观的情感则被遗漏”^{[11]14}。

20世纪70年代，对于空间研究出现了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的“文化转向”。人文地理学者以存在主义、现象学和人本主义的研究视野^[15-19]，关注具体群体“空间生活经验”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space) 和“地方感” (the sense of place) 等研究主题。德国和法国地理学研究中基于“日常生活”视角进行景观研究的传统被重新忆及。在德国，19世纪50年代，在学校教育中将地理学视作乡土科学 (Heimatkunde)，其目标是教育德国年轻人认识国家景观、人民和传统，其地理学被赋



3 具有文化意义的印第安人 (3-1)、中国人 (3-2)、玛雅人 (3-3) 的方位观
The orientation view of Indian (3-1), Chinese (3-2), and Mayan (3-3), with cultural meaning

表 1 地理学“景观”研究主旨及内容
Tab. 1 The purpose and content of geography “landscape” research

出现时期	代表人物	研究主旨	哲学	知识类型
19 世纪中后期—20 世纪初	洪堡、帕萨格	区域特性	经验主义	实在知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李特尔、拉策尔、施吕特尔	景观蕴含的人地关系	实证主义	抽象知识
20 世纪 20—70 年代	卡尔·索尔、科斯格罗夫	景观的文化史见证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段义孚等	景观的文化与情感价值	人本主义	知觉知识

予文化保存的功能^{[1]12}。在法国，其地理学派创立人维达尔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及维达尔学派 (Vidalian) 研究地理的思想核心是对传统生活观察解析基础上的人与环境的垂直关系的解析，称作“生活方式” (way of life, 法语: genres de vie) 的研究视野。作为景观研究的现象学“文化转向”代表，提出人本主义地理学 (Humanistic Geography) 的华裔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 (Yi-Fu Tuan) 将其研究主要论题之一定为“从纯空间向……某种强烈的人文地方”转换^[7]。这种“地方”被段义孚提炼作“地方感” (topophilia)^[8]，用以理解个人或群体及其居住区域之间的情感纽带 (图 3)。

由此，文化转向视野下的景观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景观的客观特征、变迁规律的探求，景观研究的新主旨聚焦于景观所属人类群体的地方情感价值、具体景观文化意义的解释。景观研究主旨的发展需要打破既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藩篱，探究新的学术范式。

英国学者普林斯 (Hugh C. Prince) 提出了地理研究获取知识的 3 个途径及其知识属性：获取自实在世界 (real world) 的实在知识、获取自抽象世界 (abstract world) 的抽象知识、

获取自知觉世界 (imagined world) 的知觉知识^[9]。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认知，并进一步阐释为“实在知识是关于历史地理现象具体的特征性知识，抽象知识则是关于历史地理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知识。无论是实在知识，还是抽象知识，都是由外部考察历史地理现象，或者单纯强调事物的特征性侧面，或者单纯强调事物的规律性侧面。”“无论是实在知识，还是抽象知识，当询及过去的人们基于怎样的认识而组构过去的地理时，这些由外部考察所得的知识都无法回答。因此，有必要从内部考察组构过去地理的人类集团的动机、意志决定、环境评价等，历史地理学必须通过过去具体时代的人们的眼睛，来评价当时的环境、资源及文化条件，研究他们如何组构过去的地理。”^{[12]97} 菊地利夫进一步评价，20 世纪中叶以来，第三种“知觉知识”的快速发展正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的新代表性成果。

回顾景观研究主旨的发展 (表 1)。19 世纪初期刚刚进入地理学视野中的景观研究，乃基于经验主义，对景观的视觉表象的物质实在进行客观摹写描述，产生的知识是“实

在知识”；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中期，“人与环境关系”和“文化史”视野下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乃基于实证主义，对推动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过程的文化结构、文化特征、形成过程等所进行的抽象性规律研究，产生的知识是“抽象知识”；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景观蕴含的地方情感与地方价值为主旨的研究，基于人本主义，对景观文化意义不再单纯追求解释，而更强调“他者眼光”的理解，由此产生的知识是“知觉知识” (perception)。

当今，前 2 种研究范式仍常见于空间学科之中。然而，对于理解景观情感价值的“知觉性”研究，却方兴未艾。

3.2 以“知觉知识”为主旨的景观研究

研究“景观”的知觉知识，需要建立“景观”本质的新认知。景观中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作为一种存在，其物质实在或其特性、规律并不能解释其文化意义，需要且仅能通过建构其文化意义的具体人类群体的视野，方能阐述作为结果的景观的具体文化意义。以“解释景观的文化意义”为研究主旨时，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上的景观实在知识、抽象知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获取存在于具体族群情感、文化映射中的知觉世界的知觉知识；此时，有必要从建构此景观文化内涵、赋予其情感价值的人类集体内部 (即以“他者眼光”) 出发，考察其映射至景观空间之上的情感、精神信仰等文化动机，此方法为“理解性方法” (verstehen methode)^{[12]98}。

以探求“知觉知识”为主旨的景观研究，“景观不再是表面和外在的，而是人类集团表达意识、创造和认同的重要手段”“(景观)一旦呈现符号意义，遂成为形塑人们的文化母体 (matrixes)，给予人们生活上的意义”^{[13]23}。景观的本质应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质是具体族群文化在具体空间中的映射。

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化状态，为了理解景观的物质实在和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必须在具体时间的变化中进行研究，而不能把它们看作时间尺度上的静态现象。

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的研究，“它 (景

表2 人类学研究主旨及内容
Tab. 2 The purpose and content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人类学主要理论	出现时期	研究主旨	代表人物	学派	哲学	知识类型
环境决定论	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	文化发展规律	泰勒、摩尔根	文化进化、文化传播论、生态人类学 ^{a)}	先验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抽象知识
解释论	19世纪末以来	文化存在的规律	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施特劳斯	文化相对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 ^{b)}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理解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文化的意义	E. R. 利奇、V·特纳、古迪纳夫、舒尔茨	象征人类学、认识人类学、解释人类学	人本主义	知觉知识
现象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间接性主观世界(生活世界)	梅洛·庞蒂、A·舒茨	现象人类学	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	
空间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景观建构、二次景观	埃里克·赫希、迈克尔·O·汉龙	景观人类学		

注：简表以人类学研究主旨的类型为分类标准，标定历史时期为此研究主旨的出现时间，且多数仍是当今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视野。也就是说，现在人类学研究主旨多元并存。a) 生态人类学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环境决定论”流派，与以往理念有所不同；b) 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视野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荷兰结构主义学派(莱顿学派)，以1958年列维-施特劳斯的代表作《结构人类学》(第一卷)出版为形成标志。

观)不容易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不是能够‘从外部’研究的东西。景观是由人们根据他们想象的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对他人与自然间联系的解释,来创造和解释的”^{[20][42]},其方法论应当借鉴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只有我们不去企图把事物硬塞进我们为其制造的观念的框架中去时,它才能向我们显现自己”。由此,解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的文化意义,不能通过景观的外在表象描述,也不能通过抽象的景观特性及其规律的研究获得,而只能回到建构其文化意义的群体本身。这也是景观研究借鉴人类学方法,应用“景观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

4 “空间转向”的人类学与景观人类学研究

4.1 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与空间转向

作为相关学科,人类学研究主旨的转换与上述“景观”具有极高的同步性和相关性(表2)。

19世纪中叶,由“博物学”广泛研究领域细分而构建的现代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支撑了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研究,特别是《物种起源》发表后,泰勒、摩尔根等最早的一批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类似,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人类社会的抽象研究提供了先验主义的理论支撑。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

与早期将景观作为“地志”研究的地理学家类似,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文化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学说,认为人类进化、文化传播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一时期,空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客体。

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与景观的文化史学派几乎同时,文化人类学进入第二阶段——历史主义时期^[21],环境决定论受到新学者的批判,建立了以美国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宗旨的文化史学派。同时期,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将社会与文化视为有机统一体,其研究视角专注于文化要素在有机体中的功能联系,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列维-施特劳斯以探究文化群体结构中各要素间关系,并进一步将其抽象为结构性体系,发展了20世纪30年代的荷兰结构主义学派(莱顿学派)的研究。这一时期,人类群体的文化本身成为人类学的研究核心,环境(空间)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客体进一步消弭。

20世纪50—60年代,以“理解”固有社会的世界观、解释文化现象的文化意义为研究目标的人类学借鉴符号学、象征论、行为学等方法,建立的象征人类学、认识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理论体系,“空间”作为特定行为与现象存在的载体,被人类学家作为研究主体的背景重新拾起。

20世纪70年代,现象学被人类学家引

入研究视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等发展了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现象学,将人类群体“间接性主观”构成的意义世界(阿尔弗雷德·舒茨称之为“生活世界”)作为研究的主题,将其作为在“一次性构筑物”的现实基础上所创立的理念性构筑物,即“二次性构筑物”,以存在主义的视角予以客观研究。作为“生活世界”之一的“意义化空间”具备了作为研究主体进入人类学研究核心范畴的理论基础。1989年6月,英国的人类学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场以“景观人类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发端,景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正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这也标志着在人类学研究中,主旨从“文化”向“空间”正式转向,空间意义的解析成为“景观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旨。

4.2 景观人类学的方法学意义

作为新兴的研究分支,“景观人类学”近30年仍在快速发展之中。如日本学者河合洋尚在其系列论文中的阐述,“景观人类学”基于人类学主位(emics)和客位(etics)的视野,景观人类学关注景观文化意义的外来投射抑或内在映射的建立过程,产生“空间”和“场所”、“一次性”景观和“二次性”景观、外在的景观和内在的景观(风景)、“景观生产”和“景观建构”的对偶性研究范畴^[23]。研究核心目标之一是以象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环

境知觉理论还原景观文化意义的生产或建构过程。

基于景观研究实践的需求，解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景观”的文化意义的目标，除上述“还原过程”，还存在其他借鉴人类学方法的可能。例如，基于语言人类学、文化传播论，解析景观文化特征要素、景观文化丛、景观文化核心区，形成景观文化的空间结构研究；又如，借鉴功能主义人类学，对景观文化要素作为景观整体文化意义存在中的精神、社会或技术性功能，形成景观文化的功能结构研究；再如，基于解释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形成景观文化的意义结构的研究；凡此种种。

辨析人类学研究中既有范式，关注家庭、婚姻、生产组织、宗教信仰等核心对象，借鉴结构主义、象征论、认识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文化符号论、现象学等研究框架，能够更加凸显景观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方法论优势。

以“景观人类学”方法，将中微观空间尺度的乡土聚落、圣山圣地、传统农耕社会产业场所、城市风土景观等作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主位眼光、结构功能性框架等人类学研究范式为理论方法，解析具体族群精神信仰、社会生活、物质生产等活动对空间及其构成要素的多元文化内涵，有助于将以获取实在知识、抽象知识为目的的学科研究范式，拓展至以“知觉知识”为目标和出发点的更广阔的学科研究视野。

5 结语

综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人本主义视野，景观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为彼此融汇交叉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景观研究需将“理解”主位视角下的“间接性主观”存在的人文主义的景观存在作为新的研究主旨，空间的文化意义、地方情感价值等文化性解析将产生区别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知觉知识”，需要借鉴人类学百余年的发展建立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视野，特别是象征论、认知论和现象论等“理解性”方法体系。

应当看到，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

园林学科研究区域的文化，通常服务于建筑、城乡聚落、园林名胜的材料、形态、设计意匠等特征解析和类型学研究，服务于史学意义上的过程重建，抑或间接服务于当代设计实践。如何准确阐释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不同社会集团尺度的景观文化意义成为场所有效保护、积极性介入的基本前提。理解“文化转向”背景下的景观研究，能够为空间的地方意义、场所精神等研究提供新的人类学视野。近年，建筑史与人类学的学者相互沟通交流，促进了建筑人类学的蓬勃发展，而景观人类学对更广尺度空间的意义解析将会与之互补，进一步促进空间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注释 (Notes):

① “二战”后学术界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以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的文化研究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通常认为地理学的“文化转向”热潮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并促成了新文化地理学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雷尔夫 (Edward Relph)、段义孚 (Yi-Fu Tuan)、布蒂默 (Anne Buttimer)、佛尔蒙 (Armand Fremont) 等人推动的强调个人知觉、情感与地方意义的景观研究，具有明显的“文化转向”特征。

② 美国景观学家杰克逊 (J. B. Jackson) 在其著作《发现乡土景观》中，对一份10世纪英文档案中出现的“waterscape”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解读。与我们当代所认为的“水体景观”含义不同，其指的是“由水管、下水道、沟渠组成的服务于居住区和工厂的水系统”，说明“-scape”曾经表示相似物体的组合，或组织、系统的概念。杰克逊由此进一步解释“landscape”一词，“在印欧语系原始含义中，仅指小部分乡村环境”，并“没有证据表明同当代含义中美学或情感（文化）意义相关”；美国景观地理学派的麦克赛尔指出“在英国的中世纪时期，该词被用作一个地主控制或一群特殊人居住的土地”。

③ 地理学是关于地表的科学，地表各处的分布现象不同，那各地当然有各自的个性，由是发生一种要求，将地表适当地区区分起来，并从地理学上，把握它那有个性的景观，想要认识地理学的个体，宛如认识生物学的个体一般（见参考文献 [8]）。

④ 本研究中出现了景域学派 (Landschaft School) 和景观学派 (Landscape School) 两个地理学学派名称。其中，前者指早期洪堡、施吕特等开启的景观研究，其承袭德国地理研究中兼具地貌学、区域学视野的传统，实质上仍然包括了景观、区域两个研究领域，故一般译作“景域学派”；后者指20世纪20年代后，已经剔除了“区域”研究视野后的单纯“景观”研究，特别是指，以1925年德裔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发表的《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为标志，将文化驱动下，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过程作为研究主旨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译作“景观学派”。

⑤ 索尔与其在伯克利的同事历史学者博尔顿、人类学者克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克拉瓦尔. 地理学思想史 [M]. 4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8-311.
- [2] 王绍增. 园林、景观与中国风景园林的未来 [J]. 中国园林, 2005 (3): 24-27.
- [3] 林广思. 景观词义的演变与辨析 (2) [J]. 中国园林, 2006, 22 (7): 21-25.
- [4] 杰克逊. 发现乡土景观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5.
- [5] 张海. 景观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实践 [J]. 南方文物, 2010 (4): 8-17.
- [6] 约翰斯顿. 人文地理学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33-367.
- [7] OLWIG K. Recovering the Substantive Nature of Landscape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6, 86(4): 630-53.
- [8] 辻村太郎. 景观地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3-6.
- [9] NAVEH Z, LIEBERMAN A S. Landscape Ec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84: 13.
- [10] 肖笃宁. 论现代景观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J]. 地理科学, 1999 (4): 379-384.
- [11] 马丁. 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15-221.
- [12] 菊地利夫.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1-98.
- [13] LEIGHLY J. Land and Lif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315-350.
- [14] 霍斯金斯. 英格兰景观的形成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4.
- [15] COSGROVE D 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1.
- [16] SAMUELS M. The Biography of Landscape: Cause and Culpability [M] // MEINIG 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7] KOBAYASHI A.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Landscape [M] // KOBAYASHI A, MACKENZIE S. Remak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164-185.
- [18] TUAN Y F. Humanistic Geography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66(2): 266-276.
- [19]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0] 约翰斯顿.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42.
- [21] PRINCE H. C. Real, Imagined and Abstract Worlds of the Past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71(3): 1-86.
- [22] 凌部恒雄. 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75.
- [23] 河合洋尚. 景观人类学的动向和视野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 59.

图表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1~2、表1~2均由作者绘制；图3改编自《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编辑 / 王一兰 王亚莺)